

## 第一章

# 国民素质——一个关系 民族兴衰的话题

中国人进入近代的门槛之前，盘桓过一段不短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积弱积贫，藏污纳垢。近代的帷幕拉开之后，列强的轮番侵侮，反侵略斗争的节节败退，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了中国人的素质劣迹。面对同胞的深重灾难，近代先驱者们怀着一颗颗破碎的心灵，苦苦求索疗治国民素质的良方良策，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思维的局限，他们没有能解析出这一复杂的世纪性方程。直到本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的素质培养才真正提上日程，才真正进入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 第 一 节

### 背负屈辱前行的近代国民

有太多的资料表明：历史的车轮穿过奴隶制的城堡，驶进封建社会之后，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都取文明率先姿态，保持着一种光彩夺目的正面形象。

远的不说。公元 7 世纪至 9 世纪，欧罗巴和西亚极疲惫的人民，住在茅屋土堡构成的市街，而中国无数市民就已过着秩序井然、平和幸福的日子。公元 13 世纪末，欧洲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那举世闻名的游记中，花费上百万个优美的词汇夸赞中国，他称中国有如天堂一般，遍地是丝绸，遍地是黄金，遍地是壮丽华美的宫殿、城市和邑镇。事隔三个世纪，公元 1583 年，意大利的利玛窦乘桴东来，几经磨难进入中国内地，面对气魄宏大的帝国景象，面对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这位聪慧的传教士也不得不感到震慑，不得不诚惶诚恐修改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转移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让中国端坐天下之中。又过了两个世纪，公元 1798 年，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征服了半个欧洲，接连征服了埃及，却出人意料地停止挥戈东进的脚步，这位著名的矮子统帅用高深莫测的口吻说：让中国沉睡吧！当它醒来时，必将震惊世界。

试想，在这样的岁月里，谁能料想到中国后来会跪着进入近代？谁能想到中国人会跪在列强的皮鞭和屠刀下颤栗着孱弱而惨痛的灵魂？

## 一 蜷曲在古长城下冬眠

当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还未被炮火轰断，紫禁城苍老厚重的大门未被强力撞开之时，守望域中图景的中国人，从皇帝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皂隶，没有谁会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厄运，没有谁会相信遥远的西边能产生巨变和威胁。在中国人看来，西边，只不过是收纳落日的蛮荒之地。在那里，未开化的夷狄除了见到弥漫的风沙、残阳的余辉，就只有灰暗沉寂的长夜，稀微的星光和凄凉的冷月。

中国人大概不知道，历史总是走自己的路，并不在乎你想到没想到，相信不相信。

事实上，早在 14 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在罗马的废墟上苏醒过来，抹去了中世纪的怪影，结束了为时千年的踟躅和徘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后四五百年间，西方人在无数次的升帆降帆、出海入海中炼就了开放的品格，培养出了科学的智慧和强烈的扩张愿望。到 18 世纪，随着生产的变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sup>①</sup>，意气风发的西方人努力挣破封建势力的樊笼，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跑步进入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他们不仅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积累了抵得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财富，而且以野蛮的方式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四下开辟市场，扩展势力和地盘。19 世纪初，一双双魔掌从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沿着血腥的扩张之路，向神秘而诱人的华夏古国伸展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步入苍老之境的中国封建社会却开始蜷缩在灰暗的长城脚下，昏昏欲睡，缓慢地迫近历史的终点。

这时候的中国人拖着疲惫无力的身影，守望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互依存的狭窄天地里，日出而作，日息而止，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和习惯，顺从自然的常规节律，演奏着千年不变的田园慢板，延续着千年不变的生产方式。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外是各家各户彼此隔绝，互相独立，自给自足，不假外求；不外是洪炉风箱的喘息，手摇纺车的呻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力牛耕的苍凉吆喝。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耕种、养殖、采集、纺织。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描述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 500 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见，这几个世纪里，与西方人凭借自然科学的智慧和工业文明，不断走向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不同，中国人总是把持着自然经济的命脉，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兜圈子。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冲动，求取生存主动性的进取精神，一再被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阉割、消解和泯灭；本来就细如游丝的机器的声音，一再被原始而保守的田园牧歌压抑和销解。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由于家庭手工业的排挤打击，也由于大地主、商人的控制和垄断，在营养不良的自然经济母体内苦苦蠕动挣扎，显示将要胎死的征兆。

与经济的停滞同时，政治上，垂死的封建王朝竭力以表面的昌明隆盛，掩盖着日薄西山的萧瑟荒凉，掩盖着民生日蹙、危机四伏、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社会现实，掩盖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掩盖着宗法制度的腐朽、糜烂和罪恶，掩盖着中国人生活境遇的悒闷和难挨。乾隆年间，表面上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柳繁华、温柔富贵，连绵不断的显赫排场，锦衣玉食，欢声笑语，赏心乐事；实际上，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贿赂公行，贪污之风遍及全国。仅宠臣大学士和珅，占有土地 80 多万亩，贪污受贿所得的家产就达 2.4 亿两白银之多，相当于清政府 5 年的国库收入。至于其他朝廷大臣及各州县官吏，则层层搜刮，构成一幅争相剥削压迫下层人民的社会图画。《清实录》记载：“督抚司道

等则取之于州县，州县则取之于百姓，层层朘剥，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嘉庆年间，从皇帝到地方豪绅，大肆兼并土地，中饱私囊，挥霍浪费，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下层民众则大批失去土地，流落他乡，卖儿鬻女，奔走呼号。嘉庆元年的一个寒夜，聚集北京的 10 万乞丐，有 8000 人冻死饿死在刺骨的朔风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酿成波及 5 省、历时 9 年的白莲教起义，也酿成了清代王朝的急剧衰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时候，与西方人高擎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拼命构建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和创立资本主义生活乐园不同，中国人正匍匐在礼教与王法的重轭之下，被“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sup>①</sup>，并且筋疲力尽地承受着封建政治压迫的创痛，承受着宗法制度的严酷摧残。

农业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必然把封建蒙昧文化拴在同一根脐带之上。18 世纪起，爱新觉罗皇族一面对外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一切外来文明，在荒草凄凄、阴气重重、劣迹斑斑的坊墙内吟弄风花雪月，做着“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清凉美梦；一面对内实行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忙着从文人学士的肩膀上搬下独立思考的头颅。乾隆嘉庆两朝时，一道又一道封闭的帘门，隔绝了中国人与西方科技文明的联系。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传入一一中断。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一一关闭。有天人推算之妙和工匠制作之巧的西洋器械，被一一指定为“夸诈迂怪”的异端之尤。察事精确，见识广博，在科学理性传统中养育起来的西洋人，被一一称为

<sup>①</sup> 鲁迅：《灯下漫笔》，《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79 页。

“红毛蕃种”。1793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华，请求中国开放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的马戛尔尼特使，一再被要求向大清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英方的船队停泊未稳，就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旗帜；英方的各项要求，在“十全老人”乾隆爷的（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中——遭到拒绝：“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1816年英国派遣罗尔美和马礼逊来华商谈贸易和海关税收，英使又一再被告诫必须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国王又一次收到中国皇上的敕谕：“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察之”；“嗣后毋遣使远来”。这种情况下，虚妄的天朝意识和文化独尊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国门日益关闭，国内文化专制日趋严重，并施展最后的也是最暴虐的余威。文字狱给知识分子布下天罗地网，“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等无可奈何的叹息风靡九州。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两朝前后100年，大小文字狱案不下100起。单是乾隆时，因捕风捉影而滥杀的冤魂，以4倍于康、雍两朝的数量在朝野飘荡。譬如，内阁学士胡中藻因作“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清”前有一“浊”字，被判为有意诋毁本朝，居心不良，立即处斩。浙江布政使书写“弘历”二字没有缺笔，犯了忌讳，被命自行了断。礼部尚书沈德潜作“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咏黑牡丹，被认为有意影射，判处剖棺戮尸。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惨遭杀戮。由于诸如此类文字狱的封杀，举国上下万马齐喑。一切生动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被紧锁在反理性、反科学的森严罗网之中，呻吟着，萎缩着，找不到解放的道路。本来就抱残守缺、死啃经书的中国知识分子，此时更被斩断了探索新事物和新

问题的兴趣和勇气，纷纷逃离恐怖，埋头钻进故纸堆，从事文字、训诂、考据、校勘之类的学问，变成迂腐、僵死的书蠹和冬烘。

总而言之，站到比较的立场上去透视 1840 年以前的历史，可以看出，西方人在连续五个世纪的变动中培植了生机与活力，实现了向现代人的飞跃，中国人却在一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中冬眠，尘封了自己的灵性和智慧，陪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衰落。这一切使近代的下跪成为必然。

## 二 血染列强的屠刀

诗人王怀让在《中国人，不跪的人》中用渗血带泪的文字写道：亿万斯年，没见过昆仑屈膝，昆仑是我们中国骄傲的腰背！千百年来，没见过长城弯腰，长城是我们民族自豪的脊椎！我们的母亲的血液中，没有跪的基因！我们的父亲的骨骼里，没有跪的骨髓！但是，中国毕竟下跪了。先是给英国人下跪，继而给日本人下跪，再而给八国联军下跪；从虎门跪到南京，从南京跪到天津，从天津跪到紫禁城内……

这个下跪的时代是在隆隆炮声中开始的。

1839 年，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人林则徐，在紫禁城的金銮宝殿前经过一番苦谏之后，奉命南下广东，一把怒火焚烧了英国人 237 万多斤走私鸦片。远村近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奔走相告，赶到虎门海滩。滚滚浓烟挟带着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升上天空，熏得西方的太阳发黄发黑。

1840 年，贪欲受挫的英国，以 4000 士兵、16 艘军舰、4 艘武装汽船、28 艘运输船、540 门大炮组成“东方远征军”，悍然集结在广东附近的海面。6 月 22 日，英国海军准将伯麦发出通

告：6月28日封锁广州海口和江面。鸦片战争爆发了，古老的中国被拖入长夜难明、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华民族被寒光闪闪的屠刀挑破了神秘的红盖头。天朝上国的神话被西来的魔鬼撕裂得支离破碎。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说过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列强跟随英国，接二连三地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国门。中国的大地在淌血，家园在沦亡，主权在丧失。1842年，中国和英国双方政府代表坐在南京的谈判桌前，英国人洋洋得意地看着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战败者，中国人在昔日“蛮夷贡使”的对桌御笔朱批：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处通商口岸，英国人租地造屋永久居住。1844年，美法两国强迫清王朝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上勾画下猩红的一笔。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当圆明园的大火仍在蔓延的时候，逃往热河的咸丰皇帝被迫派使，在《北京条约》上按下手印，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无理要求。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次年4月，73岁高龄的朝臣李鸿章带着中国人的血泪，带着北洋水师的亡灵，颤颤巍巍地走上马关春帆楼，代表岌岌可危的中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割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投资开设工厂；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总税收的三倍。1900年，英、美、法、俄、德、意、日、奥相互勾结，发动了八国联

军侵华战争，妃嫔出身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随后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又一次代表老泪纵横的中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年息 4 厘，本息共计 9.8 亿两白银。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得在内居住。拆除大沽口炮台，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组织。

鸦片战争爆发后，嗜血成性的帝国列强从海上攻到大陆，从沿海攻到内地，从广州攻到福建，攻到南京，攻到天津，攻到北京，在古老的中华国土上轮番践踏。4 万万愚弱的中国人开始遭受无尽的掠夺、杀戮，陷入空前绝后的灾难之中。初期，中国的史书记载：英国人进入广东“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掠买良民，筑室立寨”。英国人自己披露：“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不再作任何伪装，不再保持对待一个大国应有的礼貌，侵略更为凶残，奴役更为歹毒，中国人的苦难更为深广。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记录：“诸夷性皆贪而极淫，所到之地，首掳银钱衣物，次及牲畜，或宰食，或牵卖，虽鸡犬靡有孑遗。”见妇女，则未有不淫，无论青娥老嫗，西子无盐，避之不早，死之不速，无不被污被掳者。前在张家湾，妇女闻警自尽者二千数百人。”“广渠门外双树村，有金庄头者，家可中产，二女娉婷，长年 20，次年 17，夷人骤至，寻取财物净尽，并掠其处子去，金恐被污，奋力追及，手刃二女而回，卧而思之，鞠育思勤，一朝剗刃，痛不欲生，因自焚，全家俱烬。”《第二次鸦片战争》收录随军牧师 M. Ghee 对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血腥记叙：焚火的“命令发下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这一缕一缕

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亏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1901年，朝廷派员到北京，向八国认罪，请求停止军事行动。杀红了眼的各国强盗反应冷淡，再度合谋趁此机会，把中国瓜分。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无辜者，家破人亡，痛哭无告，代替黑暗的朝廷承受凌迟酷刑。

这是怎样灾难深重的中国人！这是怎样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听听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悲苦陈辞就够了：“吾中国四万万人民，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 三 蓝眼光里的“东亚病夫”

列强的残暴侵侮，民族的沉重危机，激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和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奋力反抗。历史白纸黑字写着：早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先后壮烈牺牲，殷红的鲜血溅染在倒地的龙旗上。定海的农民捕杀出城掠夺的英国士兵，切断食物供应，使困守定海空城的英军陷入窘境，因病住院者达半数以上。浙江宁波、镇海的劳苦大众组成黑水党，驾着八桨小艇在江中捕杀敌人，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广州附近三元里一带，103乡的农民、渔民和打石、纺织工人，高呼“旗进入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的口号，击杀英军50余人。直到1900年，北京南苑附近，一小队手持武器的义和团被狂怒

的激情所鼓动，几乎像发疯似地向英军猛击，身体被子弹洞穿，仍挣扎着重新进攻。

不过，本世纪 20 年代以前，中华民族的各种反抗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整个中国已经根本不能抵挡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种种邪恶和侵略。相反，在列强一声“东亚病夫”的辱喝中，善良的中国人只得用含冤的耻辱和委屈来书写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的近代史，书写这部令 5000 年以来文明中国无地自容、令亿万年以后文明中国无法忘记的屈辱史。

这里的根本原因，按照寻常的说法，在于昏聩腐败的统治者已经完全失去民族气节，在于封建朝廷已经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也在于朝廷抵抗方略的愚昧和武器的落后。

诚然，这是有道理的。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大约 90 万八旗兵、绿营兵，使用刀、矛、弓箭、剑、藤牌和少量火绳炮、滑膛炮等老式兵器，对付英军的军舰和大炮。1841 年，皇侄、御前大臣奕山接受英将义律的条件，偷偷签订“广州和约”，道光皇帝一道圣谕：“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对投降的奕山不加处置，反将已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发往伊犁，效力赎罪”。1868 年，清政府派出一个外使团，首席代表竟然是一个名叫蒲安臣的美国人。1888 年，中国历史上最为厚颜无耻的女人慈禧，从海军军费中抽取上百万两白银修建颐和园，使北洋舰队坐视炮舰衰旧。1895 年 3 月，中日议和，日本暴徒小山丰太郎枪击中方全权大臣，致使李鸿章左眼蒙上一块血淋淋的纱布，另一些国家也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清王朝却一再表彰李氏“言论自若，气不少衰”。1900 年 8 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在逃亡西安的路上，望着苍黄的落日，咬牙切齿地下令，对义和团要一一“痛加铲除”。1901 年，在签订丧权辱国的卖身契《辛丑条约》之

后，“洋人的朝廷”又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声称这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诸如此类的事实证明：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一再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

但是，我们不得不痛心指出：无辜的中国人遭受如此长久而沉重的屈辱，国民素质的低劣是一个极重要的悲剧因子。早在18世纪末，马戛尔尼来华，从口袋里取出一小盒火柴，顺手擦燃，使在场的中国官员惊出一身老汗。马氏当即觉察到中国的危机：“中国的科学知识甚劣别国，它的军队既未受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矛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能抵挡否？”19世纪，中国人完全丧失了一个优秀民族所有的气质和禀赋，已经愚不可及。他们在夹带着炮火与罪恶的工业文明面前，在贪婪暴虐的列强面前，就只能落入可欺可侮、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

看看那一幅幅可悲可叹的图画：

1841年3月，广州守将杨芳下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阻止英舰的疯狂进攻。1841年初，皇侄奕山奉道光皇帝之命率部拒英，一路上游山玩水，花天酒地，敲诈勒索，从北京到杭州花了4个月时间。后来他凭着一个荒唐的梦境出兵进攻，万余名正规军和两万余名乡勇水勇全部溃散死伤。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中国人手无缚鸡之力，关门闭户祈祷东北天空出现“将星”来辅清灭夷；《庚申夷氛纪略》甚至记载了愚弱的国民为洋人抬轿的劣迹：“是日所过马步队，尽是夷人，惟轿夫乃是潮勇，穿着国朝衣帽，却为夷酋打轿，得意洋洋，殊堪发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守旧的士大夫官员仍在“上书言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仍在讨论西方人的日心说，是想毁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

三纲而已；讨论“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头向地”，违背中华“男女向背端坐腹中”的传统观念。1900年，义和团在洋人的洋枪洋炮面前，焚香佩符，念咒降神，四处香烟缭绕，神秘恐怖。而北京天津一带的居民兴高采烈，纷纷传说：练过义和团的儿童，用一根绳子可以拽倒洋人的高大教堂；十余个练过“红灯照”的少女，凭借一摇扇一手帕升到半空，飞往十六国，投火焚烧洋人的家园；玉皇大帝已勒令天兵天将下凡，关公为先锋，二郎神为合后，中部有赵子龙、马孟起、尉迟敬德、杨继业诸将，浩浩荡荡攻打洋人。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外敌入侵的先例，世界历史上不是没有过弱肉强食的先例，有哪一个例证里的被侵者、被食者，如19世纪的中国人这样的愚弱、无力、窝囊？不错，中国人有过竭力地反抗，但那反抗的声音，较之列强的枪声、炮声、皮鞭声，实在太为弱小，弱小得就像是浩瀚荒漠中失群的羔羊所发出的一声咩叫。

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给中国和中国人罩下种种神秘的面纱。伏尔泰说，中国立国古老，文明完美，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富有理性的人。魁奈认为，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历代皇帝的专制与贤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的国家。19世纪下半叶，被启蒙巨子们欺骗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侵略者，用暴烈的武力恶毒地发现：中国人原来多是老弱病残，可欺可侮。面纱撕破了，中国人羸弱的本相裸露出来，贪婪的入侵者变得更为肆无忌惮。

落后要挨打，愚昧要挨打，素质低劣要挨打，挨打后还要被嘲弄，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 第 二 节

### 先驱者的艰苦求索

中华民族毕竟是优秀的民族。一个真正称得上优秀的民族，哪怕陷入灭顶之灾，只要有一线生机，只要一息尚存，就会有它的先进分子出来思考前途和去向。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面对龙旗撕裂，面对国土沦亡，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与屈辱，优秀的中华民族里，正有一批批志士仁人，从苦海和火山走出来，从铺天盖地的哀痛和忧愤中走出来，从宫墙剥落、危机四伏的封建营垒里走出来，从罪恶的昏睡中走出来，思考挽救时代危局的大问题，思考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或许，在今天看来，他们那一双双挽救危局的手，瘦弱得像炼狱之窗伸出的枯臂，他们那一颗颗为危局忧虑的心，破碎得像骤雨淋过的落花，然而我们要说，他们的手上和心上勃发着当时救国救民的时代精神。

或许，他们的一次次努力，一次次探索，并没有能给国民求得解放的出路，甚至没有能给国民抹除太多的灾难，然而，他们的努力探索正是引导国民前行的灯火，至少能惊醒沉睡中的国民。

或许，他们知道救治国民的路太长太险，但他们牢记着屈子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一 用利器磨洗耻辱

第一批求索国民出路的志士仁人，可以追溯到林则徐、魏源，主要代表为洋务派巨擘李鸿章、冯桂芬、王韬、薛福成、张之洞等。他们走的是通过科学技术西化救治国民之路。

林则徐在跨进近代中国的门槛以后，就命人搜索、翻译外文书报 组织编撰《四洲志》、《华事夷言》 率先在夷夏之间的铁壁上凿开一扇窗口，向国人传递海外的各种信息和知识。魏源在林则徐的基础上，把《四洲志》扩编成《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和先进科技、军事，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 林则徐和魏源表明了清醒的中国人正面迎接西方科技的最早态度，开启了用西方科技救国救民的最早构思，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的第一步。

可惜的是，由于闭关自守的历史惯性束缚，中国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上延挨、蹉跎了 20 年。洋务派兴起的时候，国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危机不断加重。原先只是通过坚船利炮的层面呈现出来的西方科技，随着战争的扩大，也从工程技术、科学理论、文化教育、机器生产诸方面映入中国人的眼帘，并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格局、生活进程发生全面碰撞。在小农经济的甬道上缓缓爬行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严峻挑战。

洋务派的始作俑者和主将，是清廷内的一部分忧心如焚、自强不息的封疆大吏。他们一方面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重的失败和巨大的损失，已经预示着中国再不振作，将不复存在于世界，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一个空前的危局之中：“一国生事，诸

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sup>①</sup> 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在战争中连连落败，不只因为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因为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必符不如人。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发出惊呼：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今日之最要最先者，莫过于驭夷一事；而要驭夷，必须废科举，采西学，办工厂，制利器，兴商贸。

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陆续引入中华大地，并且艰难地不可阻挡地成长、发育、壮大起来。西学的传播渠道日益增加，并且迅猛冲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堤岸。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各地兴办的洋务企业中大规模地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引进外籍工匠和技师。江南机器制造局创办之初，雇用英国工程师彭他、柯尼施、梅因生、史蒂芬生，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开平矿物局等，也雇请法、德、英、比等国工程师多人。京师同文馆30年间译著200种，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20年间译书160余种。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已拥有一支约80多艘军舰的海军，居世界海军第4位。沿海各省口岸炮台林立，仅旅顺港就有18座。全国建立近代民用企业共167家。航运、铁路、电报、邮政、煤矿、冶炼、轻工业、机器维修业、纺织、造纸诸产业在官僚和权力的挟制下在各地兴起。

按一般的说法，洋务派在历史上亮出来的形象是一种“女娟”形象。他们发动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

<sup>①</sup>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十四，第11页。

务运动，终极目的是想用远西的“五色石”来补中国王朝的苍天，是想借大机器工业推动即将停止的封建社会的大石磨，是想驱走外夷以扶封建统治大厦之将倾。洋务的巨子们自己也可以作证：取夷之长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不过应该指出：由于中国历来讲“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国”中自有“家”与“民”在，因此，洋务派救国补天的初衷里应该蕴含着救治国民的因素，他们不会完全把民众抛在一边。同时，由于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引入，必须通过建立工厂、设置学堂、创办实业等途径转化为国民的行为，落实到国民的素质上，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稳根。因此，洋务派的各种举措必然在客观上激发、培养着中国人的国民素质。

事实上，近代中国一批批懂得西方科学技术和熟悉西方情况的新国民，就是喝着洋务运动的奶水成长的。北京同文馆创办以后，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据统计，有 28 人做过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其中有汪凤藻、陆征祥、颜惠庆等声名显赫的人物。1890 年前设立的海军学校，为中国海军培养了 13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1872 年至 1886 年，7 批留学生共计 200 余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往各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强兵富国之术。他们之中有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有在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身殉国的邓世昌、林泰曾，有设计和督修了我国第一条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此外，各种西方著作的翻译，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如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及生理等的开设，各种外籍工匠、技师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演示传授，一番番欧风美雨，都给当时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国民素质注入